

从文化治理到治理文化：“以文资治”的生成机理与方法论自觉

代玉启,于 洋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文化与治理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耦合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文化为治理实践提供支撑,更表现为治理过程对文化特质的吸纳与转化。文化领域的系统性治理与创新性优化,能够充分释放文化的治理效能,为治理实践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在新时代背景下,治理文化的生成机理与演化路径呈现鲜明的多维度特征,具体表现为文化在微观层面的人心治理、中观层面的社会治理、宏观层面的国家治理及全球视野下的国际治理等4个层面的递进式、系统化作用机制。“以文资治”作为一种创新性的治理范式,基于文化与治理的双向赋能,在突破“文化工具论”的思维桎梏中确证文化的价值性与目的性,以更好地引领和充分激发文化的治理效能。相较于传统的刚性治理模式,“以文资治”展现出独特的治理优势:在方法论层面,注重发挥文化的柔性张力、弹性势能和浸润特性;在实践路径层面,通过系统释放中华文明的历史势能、有效激发软性文化的硬核效应、持续优化社会运行的综合成本,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这种治理范式的创新,不仅促进了治理效能的量质提升,还实现了从文化治理到治理文化逻辑跃升的方法论自觉。

关键词:文化治理;治理文化;文化软实力;治理能力;治理体系

“文化”在中文语境下有“文治教化”与“以文化人”的内涵,西方语境下的“文化”同样具有“耕作、培养、教育”的含义^[1]。全球治理委员会将“治理”一词定义为一种持续的调和过程,旨在协调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并促成联合行动。这一过程不仅涵盖强制性的正式制度与规则,也包括人们自愿接受或认为符合自身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2]。文化与治理具有内在耦合性,将文化和治理结合起来讨论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主要形成了“文化治理”和“治理文化”两种研究视角。有学者指出,

“治理文化”是以文化作为治理对象^[3],对文化现象及其内在逻辑进行调控与管理^[4];还有学者将“文化治理”视为国家的一种发展阶段,提出将文化融入治理^[5],或把文化视作治理工具^[6],强调借助文化进行社会治理^[7],倾向于“以治成文”,即通过治理实践形成特定的文化形态^[8]。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聚焦于文化治理与政治、经济、社会的接域与冲突^[9],旨在探讨如何通过文化资源的配置与优化等实现治理目标等^[10]。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虽然对“文化治理”与

引用文本:代玉启,于洋.从文化治理到治理文化：“以文资治”的生成机理与方法论自觉[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7(2):39-5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3BKS111)

作者简介:代玉启(1984—),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党的建设、青年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E-mail:daiyuqi@zju.edu.cn

“治理文化”进行了初步区分,但两者之间的界限仍显模糊,在概念理解上容易产生混淆,且研究视角偏狭,未能从整体维度上加以把握。本研究提出的“以文资治”,指的是一种体现文化与治理良性互动关系的理念与实践模式,一方面将文化作为达成治理目标的有效手段,充分发挥文化的工具性作用;另一方面超越了对文化的功利性运用,凸显文化的价值性与目的性。“以文资治”不是文化领域的单纯聚焦,而是社会整体治理的崭新样态,实现了从文化治理向治理文化的逻辑跃升。在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新征程上,“以文资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文化领域的治理与优化

针对文化领域进行系统性治理与优化,能够充分释放文化的内在势能,使其在治理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工具性作用并实现价值性引领,从而全面提升治理效能。长期以来,我国通过持续推进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振兴及文化乱象整治等一系列举措,实现了文化领域的内生优化与动态发展,这不仅为提升文化治理效能创造了条件,也为“以文资治”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文化事业的繁荣

文化事业是以体制为依托、以文化服务及文化建设为核心内容的非营利性工作。文化事业的顺利开展,不是个人、单一部门或某一文化领域“单打独斗”即可实现,而是需要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与协调运行。作为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核心构成,文化事业承担着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社会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11]这种以需求为导向的文化供给模式,将文化事业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深度融合了治理理念,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效能,推动了文化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文化事业的繁荣不仅能够丰富社会文化生活,更能够激发文化在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使其在凝聚共识、引导价值、促进和谐等方面发挥效能,以文化与治理

的深度融合与良性互动为“以文资治”筑牢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一项民心工程,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共建共享,统筹城乡和区域文化均等化协调发展。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政策和制度体系来增强对文化事业的领导和治理^[12],推动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形成,促进文化事业实现内生优化和动态发展。《“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13]。截至2023年底,全国共有群众文化机构4.4万个^[14],建成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铺设形成了覆盖国家、省、市、县、乡、村(社区)六级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有效推动了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全面推进,基础设施进一步夯实,灵活推动数字技术赋能文化惠民工程,服务能力和普惠水平不断提高,居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保障,实现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三重转变:服务对象从“重点人群”转向“全民覆盖”、服务内容从“基础保障”转向“品质提升”、服务功能从“文化娱乐”转向“价值塑造”。

整体而言,新时代文化事业发展实现了从“送文化”到“种文化”的理念跨越,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依托文化公共设施、文化公共服务、文化产品等社会文化资源,人民广泛参与阅读、文娱、体育、艺术等文化实践,体验文化成果、提升审美能力、行使文化权利。通过持续优化服务网络、提升内容品质、创新供给方式,文化事业成了凝聚社会共识、增强文化自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如,浙江省通过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创新建立“文化特派员”制度,依托丰富的文化教育资源,广泛动员机关、高校、企事业单位、文化协会等社会各界力量,派驻特派员深入省市县乡村一线,协同推进基层文化建设,为全国文化服务体系的优化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要“大力推动文化事业发展,通过文化交流、沟通心灵、开阔眼界、增进共识,让人们在持续的以文化人中提升素养,

让文化为人类进步助力。”^[15]同时,还要通过优化文化资源配置、创新文化服务模式,推动文化事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为文化势能的充分释放奠定坚实基础。

2. 文化产业的振兴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在研究制定“十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提出“文化产业”这一概念^[16],并强调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17]。相关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6.0%。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比上年增长9.8%^[18]。我国文化产业年均增速明显高于GDP增速,是增长较快的行业之一,且发展质量也在稳步提升^[19]。

一直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发展,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保障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将文化产业确立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形成影视、出版、演艺、动漫、游戏等多元业态协同发展的产业矩阵。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and 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20]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and 市场体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21]为此,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精准措施:在供给侧方面,实施文化领域“放管服”改革,将行政审批事项精简,建立国家艺术基金、文化产业专项资金等扶持机制;在需求侧方面,推出文化消费补贴、惠民演出等政策,培育出规模超大的文化消费市场。同时,随着财税金融支持体系的日益完善,文化企业享受增值税减免、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文化类特色银行、文化产权交易所等新型金融机构相继设立,为文化产业发展构建起全周期的政策支持体系。

当前,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正在重构文化产业生态,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促使文化生产从“作坊式”创作转向智能化生产,从单向传播转向沉浸式体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22]文化产业通过“破圈”融合创

造了几何级增长动能。“文化+互联网”“文化+科技”“文化+旅游”等多种新型业态涌现,延展了文化产业链,提高了文化产业附加值,增强了文化产业发展的裂变效应,丰富了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形式。以电影产业为例,2025年上映的《哪吒2》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相结合,重新解读中国传统神话,仅上映15天就突破90亿票房,带动了衍生品开发、主题乐园、文化旅游等周边产业的发展。这既体现了观众对优质文化内容的强烈需求,也展现出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显示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巨大潜力。

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到“文化唱戏、经济助力”,目前我国文化产业进入了提质增效的新阶段。发展文化产业的目的是不单纯指向经济,而是以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文化的价值转换,从而影响治理模式^[5]。文化产业振兴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通过不断优化实现内涵式发展,这种“换角”式发展首先建立在对文化产业战略价值的深刻认知上,即在新发展格局下,文化产业日益呈现出创新要素集聚性强、价值链延伸度广、生态辐射效应强等新的时代特征,既能创造万亿级经济价值,又能重塑社会精神风貌。作为文化与经济深度融合的载体,文化产业在推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促进文化创新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其高质量发展也为文化治理效能的发挥提供了重要支撑。因此,未来的文化产业发展要在培育原创能力、构建国际传播体系、创建新型业态规范等方面持续发力,以推动文化产业发挥更为优质的治理效能。

3. 文化乱象的整治

文化乱象的整治是文化领域治理与优化的关键环节,体现了文化治理的问题意识。面对资本逐利异化、历史虚无主义肆行、低俗内容泛滥等问题,通过构建全链条治理体系、强化法治约束、创新技术监管等,守住文化发展底线,巩固意识形态阵地,净化文化生态,疏通文化势能的释放路径。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与创造力的源泉。党和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将整治文化乱象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通过全方位布局、系统性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强化

主流媒体功能是整治文化乱象的重中之重。主流媒体凭借深厚的专业积淀,以权威报道、深度解读进行答疑解惑,是群众思想动态的“引航员”。在保持群众信任度的基础上,主流媒体充分利用新技术新平台,以更加喜闻乐见的方式进入群众视野,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文化创作兼顾思想启迪与艺术美感,从诗词歌赋到传统技艺,为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带来丰盛滋养,极大提升了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春风化雨深入人心。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空间已成为文化乱象整治的主战场。为应对网络环境中日益复杂的问题,中央网信办自2016年起牵头开展“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并于2021年开始将其作为年度常态化治理机制持续推进。截至2025年2月,“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进一步巩固提升治理成效,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重点开展包括:整治春节网络环境、整治“自媒体”发布不实信息、整治短视频领域恶意营销、整治AI技术滥用乱象、整治涉企网络“黑嘴”、整治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网络直播打赏乱象、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等八项整治任务^[23]。这些举措不仅体现了国家对网络文化乱象的精准打击,更彰显了以治理为导向、以问题为抓手的系统性思维,为构建清朗网络空间、提升文化治理效能提供了保证。同时,党和国家聚焦具体领域精准打击文化乱象。如,面对“国学热”背后衍生的问题,果断叫停违规国学培训机构,拔除宣扬封建糟粕的毒瘤,对国学教育正本清源。在文物领域,叫停破坏性“仿古重建”,整改过度娱乐化展陈,还原博物馆的庄重与知识殿堂属性,让历史遗迹得以真实留存。在非遗保护方面,建立动态退出机制,挽救被商业化过度侵蚀的非遗项目;规范地名文化,重拾历史记忆,恢复“朱雀大街”“朝天门”等古韵名称,唤醒城市文化根脉;推行方言保护与规范使用,清理不合规方言节目,珍视民族语言文化宝库,构建各个民族的语言文化数据库等。

当下,文化乱象整治已经实现了从现象整治到机理根治、从“应急式清理”到“预防性治

理”的跨越式发展。不过,文化领域的治理与优化并非坦途,仍需时刻保持警惕,资本逻辑的文化霸权渗透、新技术伦理的结构性张力及代际文化认知断裂构成三重挑战,对我国文化治理体系的韧性与包容性构成系统性考验。要有针对性地推动文化赋能治理,聚焦算法价值观纠偏,构建元宇宙文化空间规则,抢占新兴领域治理高地,以引导Z世代文化,助力青年成长与文化传承创新等,如此方能不断扩大文化治理效能的辐射范围,为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振兴及文化强国建设扫清障碍、保驾护航。

二、新时代治理文化的生成机理

“文化滋养心灵,文化涵育德行,文化引领风尚。”^[24]新时代治理文化的生成机理指向明晰文化治理向治理文化转型的内在逻辑,并力图把握其演化路径。文化以治理的方式出场,在人心浸润、社会整合、国家治理和全球秩序重构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深入剖析这一生成机理并准确把握其演化路径,才能充分发挥文化与治理的耦合效应,进而推动文化治理不断走向治理文化。

1. 文化之于人心治理

“人性之镜映射的是文化的影像,人之为人在于文化的先在性。”^[25]文化承载着教化与形塑个体的重要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不懈地做好以文化人工作^[26]。“以文化人”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命题,尽管“文”的形式日益多元,“化”的手段不断创新,但其本质始终未变——着眼于人、落脚于人。当文化作为治理要素介入人心时,既非简单的意识形态灌输,亦非机械的行为规训,而是通过文化编码重塑个体的精神世界,使治理目标转化为个体自觉的价值追求。

文化作用于人心的前提在于人拥有文化记忆。文化记忆具有鲜明的承续性,其并非个体记忆的简单累加,而是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通过群体互动与历史沉淀形塑的共享记忆体系。文化以语言、仪式、图像等多元媒介,在代际传递与社会传播中将历史经验、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刻入人的记忆深处。文化中的符号系统、叙事结构与价值取向,将零散的生活经验整

合为有意义的文化叙事,从而强化了记忆的持久性与可提取性。如,家训家规以文字或口头约定的形式,将家族文化与价值观念等传递给后代,并在其成长过程中不断强化,使其在面对生活选择时能够依据文化记忆中的准则做出判断,延续家族文化传统。人可以在文化记忆的浸润滋养下形成坚实稳定的价值内核,为治理提供自下而上持久稳固的支撑力。

文化以其独特的表意系统与象征符号,调适与润泽人的心理情感,从而发挥出独特的人心治理功能。作为社会性存在,人的情感状态始终受到外部环境与内部心理的交互影响,而文化通过其丰富的符号体系与价值内涵,介入心理情感的调适过程,激发出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如,节日文化中的特定仪式与象征物不仅唤起人们的情感共鸣,还在代际传承中强化了情感联结,为个体提供了归属感与精神慰藉。同时,文化通过艺术、文学、音乐等形式,为情感宣泄与升华提供渠道,成了一种“文化疗愈”的新范式。这种疗愈并非简单的情绪安抚,而是基于文化价值引导的深度重塑,帮助个体构建坚韧且富有弹性的心理情感结构,从而以从容姿态应对各种挑战。通过以上方式,个体情感得以升华,社会心态得以优化,文化发挥了人心治理的功能。

文化之于人心治理的深层目标是规范人的精神秩序,并升华至信仰高度,真正实现“正人心”。这种规范并非简单的矫治精神无序,而是通过文化的价值引领,构建一种正向的精神秩序,使个体在文化浸润中形成坚定的信仰追求。“良好的精神文化形塑人们的精神世界,养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独立自主的文化品格。”^[27]一方面,文化通过教育熏陶、习俗浸染、艺术感染等路径,为受众注入意义框架,使其在认知发展过程中形成结构化的思维图谱,并通过符号化、规范化的整合机制将离散的经验感知与价值观念纳入统一的解释体系,从而培育出精神秩序的最初形态。另一方面,文化持续赋予治理以动态的规范力,疏导整合人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认知困惑与价值冲突。通过内在的调节与平衡机制,文化不断优化和重构已有的精神秩序,促使个体在精神层面实现自我

超越、社会在信仰层面达成共识,从而实现人心治理的深层目标。

2. 文化之于社会治理

文化的产生、形成与发展始终与社会紧密相连。社会不仅为文化提供了物质基础与传播条件,更在运行发展中持续塑造并丰富了文化的内涵与价值。文化并不是社会治理的被动对象,而是社会治理的主体要素,是渗透至社会有机体的“毛细血管”,通过规范准则、凝聚共识和实施动员3个维度构建起完善的治理机制。

文化之于社会治理,体现为社会准则的确立与明晰。作为社会运行的规范性框架,文化通过其内在的价值体系、伦理规范与非制度化的方式为社会成员提供了普遍的行为准则与价值尺度,构建起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这些准则深深植根于特定历史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语境,经过长期实践与演化,逐渐形成了具有导向性与约束力的社会规范体系。通过符号、价值观及传统习俗等多元要素,文化为社会准则的生成提供了意义框架与价值导向。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价值理念编码为日常实践准则,使人们在公共议题中形成了稳定的价值判断。同时,文化在代际传承与社会传播过程中,不断对既有社会准则进行调适与更新,使其契合社会发展的动态需求,确保社会治理的适应性与有效性,为社会有序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文化之于社会治理,体现为集体意志的淬炼与凝聚。作为社会成员共同价值追求与行动目标的集中体现,集体意志离不开文化所发挥的“社会水泥”作用。“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生活其中的人们产生着同化作用,进而化作维系社会、民族的生生不息的巨大力量。”^[28]^[149]文化通过其共享的意义系统、历史记忆与价值认同,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共同的精神纽带与行动指引,使分散的个体意志汇聚为统一的集体意志,并升华为更高层次的社会共识与行动逻辑。一方面,文化通过符号、仪式与叙事建构,为社会成员提供共同的意义框架与情感共鸣点;另一方面,文化通过情感动员与意义赋予能力,将个体情感升华为集体共鸣。集体意志的共鸣,使离散的个体在文化纽带中重获归属感,

消解了现代社会的原子化倾向,推动了社会治理的优化。

文化之于社会治理,体现为社会动员的高效实施。社会动员作为一种激发社会成员参与社会事务、推动社会发展变革的实践过程,其成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的驱动力与凝聚力。具体而言,主要体现为3个方面:首先,文化凭借其强大的感召力塑造共同愿景。当社会面临大型公共项目建设或突发灾害应对等任务时,基于地域文化、民族文化或主流价值观念衍生的共同理想能够凝聚民众的共识与行动力。其次,文化为社会动员提供多样化的传播途径。通过文学、音乐、影视等艺术形式,信息得以迅速扩散并深入人心。如,一首激昂奋进的歌曲能够在短时间内唤起人们的斗志;一部反映社会现实的影视作品可以引发观众的深刻反思……这些文化传播形式不仅传递了信息,更通过情感共鸣与价值引导,激发了社会成员的参与热情。最后,文化所培育的社会信任与合作精神是社会动员顺畅进行的润滑剂。在崇尚诚信与合作的文化氛围中,社会组织、企业或个人更容易建立紧密联系。当社会动员需求出现时,各方能够迅速达成默契,依据各自优势高效分工协作,为解决社会问题携手共进,实现了社会力量的高效整合。

3. 文化之于国家治理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29]文化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既源于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更在于其具有连接历史传统与现代发展的贯通特性,文化之于国家治理主要体现在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党的文化领导权及国家战略布局等方面。

文化对于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历史文化上。“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30]历史文化承载着历代人民的实践经验、价值理念与智慧结晶,将抽象的国家概念具象为可感知的文化存在,在代际更迭中维系着国家认同的连续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

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31]不同历史时期,发挥文化对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作用,要依据现实需求进行选择继承与创新性变革。如,从“天下为公”的大同理念到“礼法并治”的治理哲学,德治思想与制度设计融合塑造出中国特色法治与德治协同的治理模式,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注入智慧源泉。历史文化哺育了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使其在时代浪潮中既能坚守根本,又能与时俱进,向着更加完善、更加高效的方向稳步迈进。

文化对于坚持和巩固文化领导权具有重要作用,是确保国家治理方向正确性的根本保障。作为一种“软实力”,不同于政治领导权的强制性和法律约束力,文化领导权是通过文化吸引、价值说服和社会认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32]。国家治理的核心在于政治上层建筑的构建与运作,而政治上层建筑与思想上层建筑具有本质的统一性^[33]:一方面,政治上层建筑的建立必然以特定的思想、文化、观念等为指导基础;另一方面,其确立后又反过来深刻塑造着思想上层建筑的演进轨迹。这种双向互动关系决定了国家治理必须重视思想文化层面建设,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来引领国家治理的良性发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就要高举习近平文化思想旗帜,始终坚持党在文化领域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尤其是在数字时代背景下,“贯彻落实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原则,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宣传思想工作方方面面,为实现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34],加快主流媒体的融合转型与网络生态治理,实现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适应性重构。

文化通过赋能国家战略布局,使国家治理更具系统性和协同性。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要命题;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文化之于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布局具有独特作用和重要地位,提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35]。文化深刻赋能国家战略布局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揭示了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四个重要特点,即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的重要因素、战胜风险挑战的重要力量源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36]。具体而言,在文化强国战略中,通过传承与创新,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在教育强国战略中,通过文化教育,培养具有文化自信和创新能力的时代新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保留古村落建筑的物质载体,以乡风文明建设重构乡村精神生态,实现“塑形”与“铸魂”的协同发展;在文化数字化战略中,催生文化产业新业态,激活全要素生产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文化之于全球治理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能够跨越国界、种族,承载着人类对美好世界的向往。从凝聚全人类价值共识,到弘扬推进全球倡议,再到塑造国际传播的崭新格局,文化以润物无声却又磅礴有力的姿态,全方位、多层次的作用于全球治理,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智慧与力量。

文化对于全球治理的影响,体现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与凝聚中。全人类共同价值,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体现了多元文明在历史演进中形式的价值共识,是各民族独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诉求辩证统一的集中体现。尽管不同文化体系在表现形式上存在差异,但都蕴含着对真善美的追求,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精神内核。文化具有内在的整合与调适机制,其一方面将共同价值融入各国教育体系、社会规范与国际准则,为全球治理提供普遍认同的价值导向与行为框架;另一方面不断优化和重构既有价值体系,使其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的复杂治理需求。这种动态的规范力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蓬勃生命力,为其推动全球治理提供了坚实保障。

文化对于全球治理的影响,表现在其对全球性倡议的持续推动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三大全球倡议。首先,三大全球倡议倡导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共享,主张通过文化共识打破隔阂、弥合分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次,三大全球倡议均强调可持续发展。全球发展倡议关注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性,全球安全

倡议强调持久和平与共同安全,全球文明倡议则致力于推动文明的长期交流与互鉴。再次,三大全球倡议将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维度有机结合,展现了文化与治理的深度融合。最后,三大全球倡议直面当前全球性挑战,试图通过文化的力量提出解决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以文资治”以文化为纽带,呼吁各国交流互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合作,将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等价值观念融入文化叙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新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文化对于全球治理的影响,体现在国际传播方面。文化既是国际传播的核心内容,又是国际传播的有效载体:其一,文化能够为国际传播提供差异化、高质量的内容支撑。从古老的历史传说、精美的传统技艺,到前沿的科技创新文化均构成了国际传播的宝贵素材,这些独特的文化内容通过故事化、可视化的方式传播,成了强化各国之间联系的“润滑剂”。其二,文化能够拓展国际传播的多元渠道,打破传统传播渠道的垄断局面。随着数智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新兴传播渠道不断涌现,为不同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契机,各国的民间文化团体、自媒体创作者等能够借助这些平台,直接向世界展示本土文化,促进了文化多样性的传播。其三,文化在国际传播中发挥着情感纽带与价值沟通的作用,增强了传播的有效性与影响力。各国文化虽存在差异,但在人民的基本价值追求上具有一致性。以文化为切入点,挖掘其中的共通元素,讲述各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故事,从而引发情感共鸣,消解文化理解障碍,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与信任,为全球治理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剖析新时代治理文化的生成机理,既基于现代治理理论对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方法、治理方式等治理要素^[37]的系统性考量,又遵循文化效能从隐性引导到显性治理转化的递进规律。治理文化的生成不是单一要素的线性发展,而是治理要素在特定条件下与文化产生的系统性重构与创新性转化。人心浸润对应治理主体的文化自觉培育,社会整合体现治理机制的协同创新,国家治理彰显治理

工具的现代转型,全球秩序则指向治理目标的升级拓展,这种结构化分析框架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文化通过价值内化、关系重构、制度创新到范式变革的生成机理,既解释了文化如何赋能治理,又揭示了治理如何吸纳文化特质。其价值在于,通过治理要素与文化维度的有机对应,不仅避免了文化论述的空泛,而且突破了传统治理分析框架的局限,为更好地理解文化治理向治理文化的范式跃迁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和实践针对性的分析视角。

三、“以文资治”的方法论自觉

“以文资治”不仅是一种文化与治理双向赋能的治理新范式,更是一种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意义的方法论创新,其以文化的柔性张力和弹性势能超越传统的刚性治理模式,在释放中华文明势能、激发软文化的硬效应和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等方面,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的方法论支持。

1. 释放中华文明的势能

势能是指储存于一个系统内部的能量,具有潜在的释放或转化能力,能够在特定条件下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38],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道德规范、人文精神等,储备着深邃的文化势能。通过“以文资治”,深入挖掘中华文明在治理目标、治理原则与治理方式等方面的现代化基因,一方面可以激活中华文明的发展势能,为现代治理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与理论支撑;另一方面可将中国价值转化为世界价值,从“自转”到“公转”^[39],全面提升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

中华文明的势能不仅体现在其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更在于其能够为现代治理提供源源不断的智慧支持。“以文资治”之所以能够释放中华文明的势能,在于其将中华文明丰富的历史资源与实践智慧转化为治理势能,释放了其在经济、社会、外交等领域的多元功能。在经济治理层面,中华文明中“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等理念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文化支撑,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挖掘这些经济智慧,“以文资治”能够推动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等新

型经济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在政治治理层面,中华文明的政治智慧为现代治理提供了多元的价值导向与策略选择,经过现代诠释与转化,为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通过整合这些政治智慧,“以文资治”能够推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治理效能的提升。在社会治理层面,中华文明的社会智慧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实践借鉴。如,传统“乡规民约”“邻里互助”等社会规范,强调社区自治与社会和谐,为现代基层治理提供了有益经验。通过激活这些社会智慧,“以文资治”能够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生态治理层面,中华文明的生态智慧为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提供了理念指引,传统“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现代生态治理提供了哲学基础。通过弘扬这些生态智慧,“以文资治”能够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

通过“以文资治”来释放中华文明势能,需要从中华文明的全局视角出发,大力推行文化保护和 cultural 创新,全面激活中华文明的潜在能量,为现代治理奠定文化基础,增添实践智慧。一方面,系统性保护是激活中华文明潜在能量的重要前提。中华文明的势能蕴藏在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与生活智慧。要构建全方位的保护体系,运用数字技术留存濒危文物信息,制定法律法规遏制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确保中华文明完整存续并持续释放能量。另一方面,“以文资治”是激活中华文明势能的必要环节。中华文明是古代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也为现代治理实践提供了重要借鉴。中华文明不应束之高阁,而要融入现代生活,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借助现代设计理念与传播手段,充分挖掘古老文明的现实价值,将其转化为契合当下治理需求的精神滋养,助推现代治理效能的提升。

2. 激发软文化的硬效应

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不同,作为一种“软力量”,文化能在潜移默化中渗透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深刻影响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行为准

则和价值取向,因而被视为治理中的精神资源与价值导向。“以文资治”正是通过文化与治理的相互作用,将文化的软力量转化为硬效应,发挥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治理功能。通过“以文资治”,文化从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具象的治理“武器”,从潜在的精神资源转化为现实的治理成果,实现了从“软”到“硬”的跨越升级。

“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40]“以文资治”能够激发文化的硬效应,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以文资治”为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构建了高效的渠道与平台。通过完善教育体系,用“以文化人”的形式将先进文化融入学校教育各阶段与各学科,实现文化的赓续传承,培养大批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同时,依托现代媒体技术与文化产业,通过影视、出版、网络等多元化传播形式,以生动、形象且易于接受的方式将文化内容广泛投送至公众视野,增强优秀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另一方面,“以文资治”推动文化与社会各领域深度交融,构建起良好的文化生态。在政策引导与制度保障下,文化与经济、科技、社会治理等领域协同发展,形成文化赋能治理、治理反哺文化的良性循环。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正是软文化发挥硬效应的典型体现,通过将文化元素融入产品设计、品牌塑造与市场营销,既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传播文化理念,实现文化价值。

为激发文化的硬效应,“以文资治”可从宏观、中观与微观3个层面展开:在宏观国家层面,党和政府要完善促进文化发展与文化治理的相关政策法规。如,加大对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设立文化发展专项资金,鼓励文化创新与文化企业发展,为软文化发挥硬效应提供政策保障与资金支持。同时,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持续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在中观社会层面,社会组织和企业应积极参与文化治理。社会组织可通过举办文化节、艺术展览、志愿服务等活动,丰富民众文化生活;企业则需树立文化品牌意识,将企业

文化建设与社会责任履行相结合,通过企业文化传播与行为示范,积极弘扬和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微观个体层面,人民要强化文化自觉意识培养与文化素养教育。人民的需要是文化的价值所在,也是“以文资治”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要培养文化自觉意识,使个体深刻认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主动参与文化传承与创新;提升文化素养,提升个体辨别、欣赏与传播文化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文化价值。当人民具备较高的文化自觉与文化素养时,他们不仅能成为文化的接受者,更能成为文化的传播者与创造者,从而为文化软实力转化为硬效应提供主体力量。

3. 降低社会运行的成本

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41]。社会运行正是这一有机体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过程,表现为社会多种要素和多层次子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多方面功能的发挥^[42]。社会运行成本涵盖政治成本、经济成本、人力成本、信任成本、沟通成本等多个方面,这些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社会治理效能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文资治”不仅是对传统治理模式的补充,更是作为一种独特且富有成效的治理范式渗透至社会运行各环节,为优化治理、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以文资治”之所以能够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在于文化可通过其内在的价值体系与伦理规范等赋能治理,使治理模式更加契合人民价值选择与实际需求,从而减少治理中产生的摩擦与损耗,提升治理的认同度与接受度。文化还可通过塑造共同愿景与凝聚社会共识,增强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减少沟通成本与信任成本。同时,文化通过其情感共鸣与行为规范功能,能够引导社会成员自觉遵守规则,降低社会治理的监督与执行成本。由此,“以文资治”便实现了社会运行成本的优化与治理效能的提升,为社会和谐与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以文资治”助力经济发展、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取得显著成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

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28]232}。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43]人文经济学强调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注重经济发展的人文底蕴和人文关切^[44],认为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从产业发展的视角看,文化创意产业的崛起是“以文资治”降低经济成本、促进人文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将文化元素融入传统产业、实现产业升级与创新,不仅提升了产品附加值,还减少了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和生产成本。这种文化赋能的产业转型,不仅推动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为构建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实践路径。

通过“以文资治”对社会运行进行“减负”,实现社会运行成本的优化与治理效能的提升,可从以下方面具体实施:首先,发挥文化的价值引领功能,为社会行为提供精准且柔性的规范。通过文学作品、传统习俗、道德故事等多样化的文化载体,将社会规范潜移默化地植入人心。在环境保护方面,生态文化的普及促使公民主动践行垃圾分类与节能减排,可以降低用于环境整治的财政开支,从而显著减少社会治理成本。其次,激发知识传承与创新活力,为社会发展提供高效动力,削减发展成本。文化创意与传统产业的融合,能够提升产品附加值,以较小的投入换取更大的产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后,搭建文化交流桥梁,化解社会矛盾。在多元文化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群体之间的分歧与冲突难以避免。文化交流活动与跨文化研究能够增进彼此了解,减少因误解与偏见引发的社会矛盾。如,医患矛盾可通过医学人文文化的传播进行缓解、城乡矛盾则可通过民俗文化 with 乡土文化的展示做以调和,进而降低社会维稳成本。

四、结 语

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黏合剂’”^{[28]149}。基于文化与治理的双向赋能,“以文资治”在突破

“文化工具论”桎梏中确证文化之于治理的价值性和目的性,从而能持续激发文化的治理效能,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就本质而言,“以文资治”既非福山“历史终结论”中的文化附庸,亦非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的对抗工具,而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与中国治理实践有机结合开创出的具有新型文化形态的治理范式,真正实现了从文化治理到治理文化逻辑跃升的方法论自觉。

参考文献:

[1] 张森.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文化治理路径[J].甘肃社会科学,2017(2):199-203.

[2] 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5):37-41.

[3] 徐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治理能力提升的三维路径探赜[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1-9.

[4] 蔡武进.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70年:历程和走向[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3):25-35.

[5] 胡惠林.国家文化治理:发展文化产业的新维度[J].学术月刊,2012(5):28-32.

[6] 祁述裕.国家文化治理建设的三大核心任务[J].探索与争鸣,2014(5):7-9.

[7] 颜玉凡,叶南客.文化治理视域下的公共文化服务——基于政府的行动逻辑[J].开放时代,2016(2):158-173.

[8] 托尼·本尼特.本尼特:文化与社会[M].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12.

[9] 刘莉.治理文化抑或文化治理?——文化治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浙江社会科学,2016(9):89-95.

[10] 施雪华,禄琼.当前中国文化治理的意义、进程与思路[J].学术界,2017(1):53-62.

[11] 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N].人民日报,2024-10-29(1).

[12] 宇文利.新时代推进文化自信自强[J].新视野,2023(3):5-12.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EB/OL].(2021-06-10)[2025-03-22].
https://zwgk.mct.gov.cn/zfxgkml/ggfw/202106/t20210623_925879.html.

- [14]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2023 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4-09-24)[2025-03-22]. https://www.stats.gov.cn/sj/sjjd/202409/t20240923_1956632.html.
- [15] 习近平.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N]. 人民日报,2014-03-28(3).
- [16] 戴俊骋. 中国文化消费政策组合促进作用研究——基于首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的 QCA 方法探索[J]. 社会科学战线,2024(11): 57-67.
- [17]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37.
- [18] 国家统计局. 2024 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6.0%[EB/OL]. (2025-01-27)[2025-03-22].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501/content_7001381.htm.
- [19] 黄永林.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引导成效及未来方向[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19):72-82.
- [20]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4.
- [2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5.
- [2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311.
- [23] 新华社. 2025 年“清朗”行动重点开展 8 项整治任务[EB/OL]. (2025-02-21)[2025-03-22].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2/content_7004896.htm.
- [24] 习近平. 论教育[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154.
- [25] 苗伟. 论人的文化主体性[J]. 云南社会科学,2012(4):55-60.
- [26] 扭住目标不放松 一张蓝图绘到底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N]. 人民日报,2024-10-17(1).
- [27] 田鹏颖. 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叙事逻辑[J]. 学术交流,2024(2):5-15.
- [28]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 [29]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64.
- [30] 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N]. 人民日报,2014-10-14(01).
- [31]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2023(17):4-11.
- [32] 代玉启.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三重治理意蕴[J]. 中州学刊,2024(8):5-13.
- [33] 陈黎梅. 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意蕴四维解读——兼驳斥“国家治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论[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7(3):49-58.
- [34] 中办国办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N]. 人民日报,2022-08-17(1).
- [35] 周建超.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J]. 求索,2024(4):32-40.
- [36] 陈联俊,郑维.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逻辑理路与价值引领[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9):13-25.
- [37] 王维国. 善治之道: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伦理路径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8.
- [3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471.
- [39] 刘孟男. 中华文明与全球治理:追本、对话与展望[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17-24.
- [4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52.
- [4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13.
- [42] 郑杭生,李强,等. 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13.
- [43] 杜尚泽,潘俊强. 总书记关注的这个题目,有中国的未来[N]. 人民日报,2023-07-10(1).
- [44] 董慧. 人文经济学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耦合互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1):1-9.

From Cultural Governance to Governance Cultur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Method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Governance by Culture” /DAI Yuqi, YU Yang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is a profound internal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governance. This relationship is reflected not only in that culture provides support for governance practice but also in that the governance process absorbs and transform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System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ve optimization in the field of culture can fully release the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culture and lay a solid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governance practice. In the new era,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evolution path of governance culture show distinct 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embodied in the progressive and systematic mechanism of culture at four levels: people’s heart governance at the micro level, social governance at the meso level, national governance at the macro level,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As an innovative governance paradigm, “governance by culture” is based on the two-way empowerment of culture and governance, and confirms the value and purpose of culture in breaking through the thinking shackles of “cultural tool theory”, thus better guiding and fully stimulating the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culture.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rigid governance model, “governance by culture” shows unique governance advantages: at the methodological level, it pays attention to the flexible tension, elastic potential energy, and infilt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e; regarding the practical path, by systematically releasing the historical potential energ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ffectively stimulating the hardcore effect of soft culture, and continuously optimizing the comprehensive cost of social operation, it provides a new source of power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innovation of this governance paradigm not only promotes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governance efficiency but also realizes the method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leaping from cultural governance to governance culture.

Key words: cultural governance; governance culture; cultural soft power; governance capacity; governance system